



固本培元,让文学之河越来越宽阔

——试论东莞素人写作的生长逻辑

□胡磊

文艺格调的提升,一方面需要创作者不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打磨写作的技巧,另一

方面需要各方面提供良好的创作氛围。东莞尽可能地出人才、出作品营造环境,努力让每一

株幼苗都有机会长成长参天大树。顺着这条路径走下去,东莞的文学之河必将越来越宽阔

时序入夏,万物葳蕤。但我想,万物既要顺势而生,也要适时而养。甚至可以说,此刻的葳蕤,得益于早年的扎根与蛰伏。这让我想到东莞的素人写作。作为新大众文艺浪潮中的一支队伍,东莞的素人作者受到了颇多关注,得到了很大支持。正是借着这样的势头,新的作者不断涌现,新的作品不断推出。在这样的热潮中,东莞将不断固本培元,打牢文学发展的根基,让更多的写作者能够心无旁骛搞创作,让更多的优秀作品被看见,推动东莞新大众文艺实现高质量发展。

—

素人写作最动人之处,正在于经验的真实性与情感的原生性。在他们的文字中,蒸腾着生活的气息,浸润着人间的温度,折射着那些未经修饰的生命脉动……所以,这类写作最动人心魄之处,恰在于它的“素”——自然、真实、不矫饰,具有鲜明的在地性。守住本色的从容,便是对自身写作美学立场的清醒与笃定。当然,光有这份质朴,也许还不够。文学品牌的内核,终究是靠作品的品质,而非单靠音量的大小。如何在粗粝本真中实现艺术性的锤炼与跃升,恰是新大众文艺进一步繁荣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与其焦虑,不如沉潜。东莞通过举办各类培训班、改稿班、研讨会,让文学名家对潜力作者进行结对式指导。那些甘坐冷板凳、沉潜于生活深处的写作者,那些质朴而饱含生命张力的文本,得到了及时的关注。

东莞素人写作需要不断地去浮气、沉底气。借“中国文艺名家看东莞”的思想碰撞,借“东莞作家写中国”的宏观视野,引导东莞素人写作从一己悲欢走向更辽阔的社会观察,从情绪宣泄跃升至有温度、有担当、有情怀的意义求索。东莞的制造业底色、打工记忆、工业文明、城市跃迁、文化新质,仍需更多写作者反复深挖,将之写实、写深、写透。在介入其他写作题材时,素人作者需要保持那些个人化的、毛茸茸的文笔,保持表达的自主性与差异性,避免沦为同质化写作。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把握“素人”标签的双刃剑效应。这一身份在带来关注的同时,也易让读者先入为主地以“身份猎奇”或“社会学标本”的眼光进行审视,无形中削弱了对其

文学本体价值的独立评判。而根据我长期的接触了解,更深层的困境在于:大多数素人作者本职工作繁重,写作依赖碎片化时间与极强的意志,创作状态极易为职业环境和生计波动所累。这些都是素人作者前进道路上面临的巨大挑战。

二

东莞素人写作借时代之势与城市底气蓬勃生发,已蔚然成势。然而,仅靠一时热度,极易随势而耗。可否将这股热潮持续下去,转化为可持续的文学“生态林”,关键在于涵养根本。

这种涵养,首先体现为机制上的完善。东莞积极联合国内丰富的文学资源,制定全链条的文学人才培养计划。这个计划不仅着眼于发现人才,更注重涵盖从扶持到展示、从传播到激励等各个环节,打造了让素人作者得以不断成长的阶梯。譬如,2025年举办鲁迅文学院东莞作家研修班,学员们走进《文艺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小说选刊》《中国校园文学》等编辑部学习交流。在东莞,“东莞文艺论见”文学沙龙、新大众文艺东莞素人写作基层培育计划等陆续推出。那些在车间与街巷间萌芽的文学种子,得以在培训班与改稿会中被悉心浇灌,从而被发现、被赋能,推出一篇篇优秀的作品。

在阵地方面,也需要不断“固土”。东莞樟木头的“中国作家第一村”、石碣镇的“湾区文学港”、桥头镇的“文学桥头堡”、长安镇的“文学之夜”……这些散布于东莞各地的文学据点和文学机制,恰如繁星点点,将创作与创新的灵感嵌入城市的日常肌理。而新大众文艺(东莞)创作与研究 centers、《中国作家》杂志驻新大众文艺(东莞)实践点、《中国校园文学》未来作家东莞实验区的设立,则为这片热土上的文学实践提供了学术观照与成果沉淀的容器,让更多的写作者不断成长。

有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提出,“我们要守护好‘新大众文艺’这个金字招牌。文艺是有高度的,不能因为‘新大众’的标签就拉低了文艺的格调”。实际上,文艺格调的提升,一方面需要创作者不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打磨写作的技巧,另一方面需要各方面提供良好的

创作氛围。东莞尽可能地出人才、出作品营造环境,努力让每一株幼苗都有机会长成长参天大树。顺着这条路径走下去,东莞的文学之河必将越来越宽阔。

三

东莞素人写作生逢其时,与宁夏“西海固文学”、湖南益阳“清溪文学村庄”、陕西铜川“乡村文艺小院”等现象一起,被很多人视为新大众文艺浪潮的典型范例。这的确为东莞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毋庸置疑,为推动各地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我们绝对不能各守一隅,而是要共养一片森林。要在差异中求合作,主动与其他地区的文学现象进行对话,在多方互动中建构文学发展的新机制。譬如,依托权威机构牵头,构建新大众文艺城市联盟,共同推出作家合作培育机制,研究作品评论与作品转化的有效路径,让各地新大众文艺的品牌效应更加凸显。

对于东莞素人写作而言,可聚焦东莞的打工文化和新工业文明,凸显自己的特色。与此同时,也需注意以素人作者的多元书写,不断丰富城市的精神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东莞石排镇的潮玩产业蓬勃发展,如果将东莞作家、东莞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东莞其他文化记忆,有效地与东莞潮玩产业融合起来,将有利于推动文学以另一种姿态走进大众的生活。立足于这样的丰富实践,可以定期举办新大众文艺活动周,发布相关的年度观察报告,进行有效的作家作品盘点,进一步擦亮东莞新大众文艺的品牌。

东莞,海纳百川,厚德务实。那些为这座城市洒下辛勤汗水的耕作者,此刻也正陆续拿起手中的笔,记录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打拼的故事。那些诞生于炭火旁、机器边、街头巷尾的文字,或许粗粝,却是一份份最诚实的记录。只要写作者始终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那些看似微小的个体记忆,终将汇流、沉淀,升华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象。而东莞的新大众文艺,也必将在气象万千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写下属于普通劳动者自己的、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作者系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南大学)研究员、东莞市作协主席〕

守住一个『真』字

□李以亮

诗人服务于语言,诗人是语言服务。普罗茨基相信语言甚至比民族、国家更长久。诗人是文明之子,要对语言负责,对文明尽自己的义务。诗人耕作于语言,而他却很可能不会得到太多的回报,甚至可能颗粒无收,而这似乎反倒使诗人的工作具有了一种奇异的奢侈性质。试想,有什么是比不计成本的投入更奢侈的呢?

所以,诗人不可能是一份正式的“职业”。这些年来,我的工作,毋宁说我的时间,一直被分为两半:为生存而奋斗的职业和与诗歌相关的业余工作。我20余岁开始踏入社会的门槛,一直从事着自己还算得心应手的专业工作,保证了我的衣食无忧,但也仅此于此。我自忖是一个较早认准了自身性格和目标的人,且天生固执而任性。我亦深知不可能改变自己的个性,也从来不曾想要改变。我也认为它没有什么不好,毕竟它算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所以我接受我的命运。

我是一个热情的人,偶尔的所谓“高冷”,也许只是措施热情后的应激反应。在我看来,热情是诗歌的标志,绝不是可有可无;而诗的冷酷或诗的冷峻,也只应是热情的伪装,是为了使热情更具有深度。诗人的热情,有时会表现为某种逆反——我至今只出版过一本诗集,它有一个我深思熟虑的题目《逆行》——我想,诗人可以不是任何秩序的敌人,但他一定是某种僵化的敌人;诗人可以不是任何权威的敌人,但他一定是势利的敌人。

对于写作者而言,“问题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我看来,现在的很多诗人已经非常要命地生活得“没有问题了”。实际上,没有问题恰恰就是最大的问题。当然,我这里所说的“问题”,主要是指那些关系到心灵世界的深刻问题。丧失问题意识,也就意味着:作为写作者或者诗人,他提不出问题来了,或者只有假问题,这必然导致其写作无法接通他人的存在。这是多么可怕!如此,却还要让写作继续,必然只能向壁虚构、强赋新词、言不及义。这时,无论如何自我感动、自卖自夸,也只能是煞有介事地制造文学垃圾。

一个写作者为什么会丧失问题意识?我也一直在思考和观察。有一点很隐蔽,那就是写作者本人似乎还很有抱负,但他已经只关心鼻子尖上那一点东西,也就是名利地位之类,写作不过是一种借以掩饰的名头。写作如果还是一个事业,那也只是一门个人的生意。是生意,就要经营,所以经营生意的兴趣和精力远在写作之上,甚至在写作上顾不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专注力。悖论的是,这样的人,为了掩饰真实的目的,就只有通过制造大量分行文字来冒充创造力,冒充才气逼人。但是,在明眼人看来,诗人依靠“成批生产”不过是自证其伪。今天,正如我们看到的,有些和尚也是生意人,有些诗人、文人其实也是生意人。我从来不歧视生意人,但是,我厌恶这样的假生意人。

自始至终,诗歌应该是一种有关生命境界的书写。这正如人们经常说的,活到什么程度就会写到什么程度,既装不出高大上,也掩饰不住境界的低劣。我一直赞美业余诗歌爱好者,赞美他们目的和动机的纯粹。从发生学和

目的论上讲,他们天然正确。不仅我永远站在他们一边,我相信,诗歌也站在他们一边——当然,这需要他们真正拥有不业余的水平。业余爱好者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许只是:如何从即兴、从无意识中发现的高度里,提炼出属于自己生命的诗,走向诗歌写作的自觉意识。换句话说,如何从不自觉的写作,获取让个人的生命受益的东西,如何让自己来到一个精神开阔的高处。

我尊重所有认真写作的人,也尊重所有写作者的不同风格。写作者身上的缺点,不应该成为我们真正关心的焦点,除非准备去做一个道德评论家。宽容的尺度在于:容忍有瑕疵的真诗,反对有瑕疵的伪诗。有人写诗好像以前没有人写过诗——这句话,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褒扬,也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讽刺。那些为诗歌

立法的天才式人物,的确在写诗时好像从没有人写过诗,大大超出了历史和传统的范式。这也不是没有,却是十分罕见的。常见的是许多自负而目中无人的庸人,他们写诗也好像从没有人写过诗,却不过是诗歌的一个笑话或灾难。

我赞同“诗从阅历中来”的原则,如此也许可以让写作具有一定程度的原创性。但是今天我们谈原创,其实是很需要一些勇气的。这不是说原创不重要,而是说原创太难、太难,所谓“互文”、所谓“影响的焦虑”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不掩饰地说,我们今天的诗歌,充满了“二手”的东西,“二手写作”虽然也许很时兴、很好吃香,却不值得效法。

诗人一生最可宝贵的是不负那一个“真”字。诗人,说到底不过是具有诗性能力的人。诗性能力,说到底只是一种深刻的发现能力和命名能力,别无其他。过于强烈的诗人身份意识,在我看来是不恰当的。写诗的时候你是一个诗人,不写诗的时候完全不必盗用诗的名义。几十年下来,我虽然在与诗人交往方面毫无长进,却自认为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了一点洞察力,保持了一种敏锐的直觉。可以说,我的直觉从来没有欺骗我。对此,我保持了坦然,这令我心安。

成为精神上自给自足的一个人,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但很多人可以做到。从这里出发,一个人如果追求自我实现,就还需要发展自己,与他者共存并奉献出自己的价值。而所谓“诗性的人生”或“审美的人生”——如果有——也绝不意味着写那么几首歪诗,那很虚荣也很无趣。我认识许多不以诗人为意更不以诗人身份自居的人,他们活得更有趣,更有意味也更有热情,甚至在精神上更有追求也更具生命本身的意义。试问,还有什么比这更具诗意的呢?我常常自忖,要向这样的人看齐。

(作者系湖北翻译家)



■声音

AI是督促我们不断提升原创力的鞭子

□胡宝林

在人工智能勃兴的今天,AI生成文章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对许多没有怎么写过文章、特别是没有进行过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或者对虽尝试过文学创作但水平不高的人士来说,AI写作确实令人惊叹。它搜罗资料广,看待问题较为全面,常常能提供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视角,语言上天入地、繁复亮丽,有时候比人动手写的还漂亮。但是,对于内行来说,常常能从中发现AI写作的缺点。譬如,AI虽有思考,但其表达有赖于已有的文本。AI搜集已有文本,按照一定逻辑混杂文本后再“加工”,其实做的还是编辑的工作,原创性欠缺。没有已有的文本,它就没有凭依,无法提供答案(文本)。所以,你动手手指,让AI生成一篇文章作品,这文学作品就不该署你的名字,因为这不是你的创作。但这是AI原创的作品吗?严格地说,它只是编辑,谈不上原创。它不是无中生有,创造出世间原先没有的东西。它只是将世间原有的文章进行了重新编辑组合。如果标示出原料的来源,那么AI原创的部分几乎没有。此外,AI虽有表达,但是公共话语比较多,且常常在逻辑上不准确。而且,“AI文”在举例子方面往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所以,很多AI写就的评论文章,例子看似很多,但都无法就其中的一个例子进行有效的深入分析。所以,看到类似的文章,我们可以判定是“AI文”。当然,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评论,“AI文”在语言上也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化特征。

“AI文”的大量涌现,对创作者有何启示和警示呢?我觉得,对现实社会的第一手调查将更为宝贵。现实社会生活无比鲜活、无比生动、无比复杂,第一手的采访、调查需要人去,需要人面对去沟通、费时费力,这个AI无法替代。现在我们常常看到,对于突发事件,网络上有些人没有深入现场采访调查,仅凭道听途说就在网络上乱发表意见,最后被反转的事实打脸。没

有深入现场的采访调查,AI再怎么整合信息,都无法还原真相。地方性知识和具身性经验将更加宝贵。细部知识和经验,未被文字和图片、视频投射到网络空间。那些网络未知的角落,那些独具个性的体验,正是我们写作的出发点。与此同时,情感的力量将弥足珍贵。人的情感可以排山倒海也可以涓涓细流,情感不可捉摸、不可量化,这是AI最为薄弱的领域,而文学创作恰恰倚重情感。情感是写作的驱动力量,也是文本获得肉身的塑造力量。

从语言表达的风格看,每一个真正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与特色。这也将作家创作与AI写作区分开来。AI也可以模仿作家的写作风格,但是它只能模仿作家已有文本的风格,作家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及其酝酿的风格变化它却难以捉摸。基于个人情感、经历和经验、地域知识、个人语言表达风格写成的文学文本,依然谁都无法替代。因此,准确、朴素、有力的个性化表达变得尤为重要。阅读那些经典作品,我们会发现,每一个经典作家的语言风格都与其生命境遇密切相关。这样的文字正如鲁迅所说,是从血管里流出来的“血”。

说了这么多,似乎我们就只有完全杜绝AI一条路。但实际上,AI无法完全阻挡,无法完全拒绝。很多人在工作中,碰到一个工作任务,可能首先会问AI,得到一个结果,再在此基础上开展自己的工作。所以,使用AI变成了很多人的自动反应。但是,作为写作者,我们要始终保持对笔下文字的敬畏。使用AI,是为了逼迫我们写出比它更好的文字,而不能直接将AI文字署上自己的名字。在这样的意义上,AI应该是我们的镜鉴,是督促我们不断提升原创力的鞭子。我们只有持续地保持自己的思考和练习,才能保持继续写作的底气。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书评

做好“社会中人”,才能更好地做“文学中人”

——评段崇轩《“开垦时代”——中国新文学潮流中的山西文学》

□傅书华

做好“社会中人”,才能更好地做“文学中人”

近期,段崇轩积数年之功,推出了一部近40万字的专著——《“开垦时代”——中国新文学潮流中的山西文学》。在书中,段崇轩在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视野中系统梳理了山西早期新文学的发展概况,并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入分析。中国新文学史有数百种,但每一种都是薄薄一两册,不可能深入分析每个地域的文学发展史。即使是山西的研究者,对山西早期新文学的发展情况也重视不够。虽然也有董大中等学者对它有所关注,但相关的研究不够系统、完整。段崇轩的这本专著,为我们展现了山西新文学第一个阶段的灿烂图景。譬如,作为革命家、社会活动家的景梅九的文学活动及创作;作为历史学家、思想家的常燕生的文学创作;作为文学社团“狂飙社”成员的高长虹、高歌等人的文学活动及创作;作为批评家、剧作家的李健吾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姚青苗的抗战文学创作,特别是《中条山的杜鹃花》的被发掘;还有山西革命文学代表高沐鸿的文学历程等。这些人的文学活动、文学实绩,或散乱于时代的风云,或沉浮于历史的长河。现在,段崇轩于故纸黄卷之中,拂去历史的尘埃,以真实的史料,将其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段崇轩通过梳理这些人的创作实绩,呈现山西早期新文学的本真面貌,并对地域与全国、边缘与中心的主体间性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譬如,景梅九是中国早期留学日本群体中的一员。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划时代的相对论原理。1922年爱因斯坦计划访问中国。当时山西的景梅九、高长虹等就率先研究相对论。这些研究体现在他们的翻译作

品、文学创作中。作为有思想家精神气象的人文学者,常燕生对政党形态有着清晰的认知与建设。“狂飙社”所体现的欧化的“狂飙精神”,高歌小说中所突出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的创作倾向”,以及李健吾“丰厚的中西方文化素养”等,都是鲜明的例证。所有这些居于时代潮流前沿的表现,都体现了当时山西文学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其实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山西人的革命热情,是与当时全国的大形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以此观之,该书所描绘的文人群体,具有这样的开放胸怀,也是可以理解的。最为突出、鲜明的例子,是高长虹与鲁迅的关系。高长虹组织的文学社团,紧紧围绕在鲁迅身边,鲁迅给予了大力扶持与引导。鲁迅1933年在致山西榴花社的信中写到,“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这也是这本书的名字的由来,不过段崇轩将“开垦时代”作了更加宽泛的理解,主要用它来指称上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山西新文学——当然,在论述具体的作家作品时,这个时间线还可能向后不断延展,以覆盖这些作家的整体创作。

段崇轩注重分析文学、创作者与时代、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书中,段崇轩将“开垦时代”的山西文人群体视为文学创作者而给以着重论述。但给我们的印象则是,这些人作为文学创作者,其“文学性”都不纯粹:景梅九更多地是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常燕生是历史学家、思想家。以高长虹为代表的“狂飙社”成员,文学只是他们投身社会革命的方式之一。所以,以文学盛名进入了延安的高长虹会与文学绝缘而去研究经济,其二弟高歌后来也远离了文学。红极一时的才女关露,

为革命投身谍战生涯而无悔于对文学生涯的放弃。贾植芳自称是“社会中人”。“文学中人”只是其“社会中人”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中人”,贾植芳立志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所以,用“社会中人”“大写的人”来概括山西早期新文学中的文人群体是非常准确的。只有做好“社会中人”“大写的人”,才能更好地做一个“文学中人”。

段崇轩最初是以对新时期文学的关注而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他曾在国内重要报刊上发表过数百万字的关于当代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评论文字。退休后,他立志进入现代文学领域,溯源当代文学的历史纵深。这本书就是他为此所作努力的一个收获。我觉得,他的这一努力,是具有重要意义。举个例子,赵树理曾多次自言,他的文学写作是为着解决农民在变革时代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而非为着自己在文学史上留下贡献与声名——虽然因此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不容轻视。在这其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山西“开垦时代”作家的遗传与影响。而在今天,我们的许多作家,可能更多地考虑自己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文学中人”,并因此将“社会中人”“大写的人”弃之不顾。可越是如此,却也影响了自己作为“文学中人”的品位、重量。我们有着悠久的以史为鉴的传统。越是进入历史的纵深,越能够对现实做出准确的判断。反过来说,越是需要对现实做出深刻、准确的判断,我们越需要进入历史的纵深。回顾前辈作家们的风采,我们可能更加明白,文学当然是文学,但文学又不仅仅是“文学”。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